

1217 俱乐部

年度书系

# 话题

# 2008

杨早 萨支山 编

把个性化的思考留给历史……

## Topic

奥运：西方媒体报道之中国民众心态  
抵债运动一百〇三年：抵制家乐福的反思  
「台湾意识」与重塑「敌人」：马英九胜选后的台海关系  
「大灾之后必有妖言」：汶川地震后的灵异谣言分析  
「准的」爱：奉献给「准」：抗震救灾中的「中产阶级」话语表述  
「范跑跑事件」引发的伦理争议  
一个中学教师的自由苦旅：「范跑跑事件」引发的伦理争议  
「文化长城」〇五「借体还魂」：京剧进课堂之争议  
「艳照门」的法律模糊与教育困局  
扎不住的篱笆：「艳照门」的法律模糊与教育困局  
经得起糟蹋的：才是真经典：古典文学名著的影视改编  
自我展示的焦虑：2008：电影里的中国

1217 俱乐部

年度书系

话题

2008

杨早 萨支山 编

Topic

生活·读书·新知 三联书店

Copyright © 2009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 
All Rights Reserved.

本作品著作权由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所有。  
未经许可，不得翻印。

##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话题 2008 / 杨早, 萨支山编. —北京: 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, 2009. 1  
(1217 俱乐部·年度书系)  
ISBN 978-7-108-03120-4

I. 话… II. ①杨…②萨… III. 社会问题—研究—中国—2008 IV. D66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192417 号

责任编辑 王振峰

封扉设计 蔡立国

出版发行 **生活·读书·新知** 三联书店

(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)

邮 编 100010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2009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

2009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635 毫米 × 965 毫米 1 / 16 印张 18.25

字 数 194 千字

印 数 0,001 — 8,000 册

定 价 29.80 元

# 2008：五种情绪

杨 早

2008 是历史感涌流泛滥的一年。它还没有走完一半，我们已经知道，这一年已经载入历史，并将与那些长久影响人类记忆的重大年份并肩而立。

这一年有太多事件值得书写，最好的与最坏的，最善的与最恶的，翘首以盼的与不期而遇的，可歌可泣的与敢怒敢言的，有些事近在眼前，却大可视若无睹，有些事远隔万里，却足以振聋发聩，有些事潜藏地底，却注定将刻骨铭心。

每一个月，都有人问我：今年的《话题》是不是要出上下册？

沉闷与平稳，似乎已经被上天预支给了 2006、2007，发掘的苦辛，被替换成选择的艰难，大事件们，意义显豁地屹立于斯，容不得你不去看，不去想，不去写。

那就索性挂一漏万吧，《话题》不是史书，不承担一网打尽的责任，让我们把有限的力量，集中在“怎么写”上面。

在这本书里，你会看到奥运，看到地震，看到抵货，看到台湾，也会看到京剧进课堂，看到影视中国，看到艳照门……它们呈现于眼前，比照你脑海中的记忆，或许会有些许“变形”的感

觉——是的，这些微的变形，正是我们做出的努力。

而照例，我试图用另一种思路，开始今年的综述。怎样从皮肤的感觉出发，又自外于这种感觉进行思考，一向是道难题，这一年，尤其。

事情太多，也许叙述的方式可以是：细细想一想，2008年带给了我们这个社会哪些情绪？

## 情绪之一：哀恸

那条短信是怎么说来着？

什么叫幸福？幸福就是：

元旦没进乌鲁木齐（警察与疆独分子枪战、恐怖分子劫机）；

2月没去郴州（南方雪灾）；

3月没逛拉萨（藏民骚乱）；

4月没到山东（火车出轨）；

5月没来汶川（四川大地震）；

6月没在瓮安（民众抗议）；

7月不在上海当警察（杨佳杀警）；

8月不在新疆当兵（恐袭军警）；

9月不住在山西（襄汾溃坝）；

小孩从来没吃过三鹿奶粉；

当然最幸福的是：今年没有进股市。

这条短信出现在年中，随着灾难新闻的不断刷新而不断增添——根据后续的资讯，我们还可以说10月不在昌平、11月不在台北也是幸福的。自然，大多数短信的收受者/改编者/转发者，除了无远弗届的“股市”，都不曾经历其中任何一场局部的灾难，然而他们通过各种媒体（电视、报刊、网络，还有传言）“经历”了每一个艰难的时段，并据此构建了他们对2008年的灾难想象——这是一个何等多灾多难的年份啊。当“不在场”成为一种幸福，同时也代表着伤痛与歉疚，正是这种心态传染了大部分的中国人，让他们成为诸多灾难中缺席的存在。

在这条短信中，各种各样的天灾与人祸并置在一起，彻底颠覆了灾难的传统等级——不是只有地震这样的大灾才对人心造成震动，灾难的等级也不取决于死伤人数的多少。（7月贵州等地水灾的死亡人数远超过杨佳杀警案，但公众的关注度要小得多。）灾难在公众感受中是否凸显，或许取决于事件在同一灾难序列之中的位置，进一步说，与社会大环境的敏感点息息相关。

公认的天灾而外，大部分“灾难”的主题都指向政府的作为，或不作为。把“政府”作为讨伐的主词，其实是一种既危险又直接的“整体想象”。危险是，这种想象很容易将历史问题、社会问题一概转化为政治问题，要求一个“全能的”政府；直接则在于，“整体想象”不仅源于政府没能预期并防止上述灾难的发生，更大的诱因在于，政府也没能在灾难发生后，及时提供信息，抚慰人心，反而放任灾难结果在民众的印象中滚动、放大为对政府形象的伤害。

面对天灾时，共同利益让民众心理天然地倾向作为组织者的

政府，而政府也不惮于公开危险程度与展示事件进程，既可以将责任分流减轻，又能增加公众凝聚力。从2003年的SARS危机，到2008年的南方雪灾与汶川地震，中国政府的行动能力举世推许，也得到了公众相当程度的信任与拥戴。

而在人为的灾祸出现后，政府认知与公众想象之间似乎有着严重的错位。政府的思路好像是：地域性的、部门性的事件，没有必要把它弄大，变成一个公共话题，以致影响民众对政府的看法与信心。但事实恰恰相反，公众虽然无法获得完全的信息，网络时代的公众却能够轻易意识到信息的不对称，由此产生“延伸想象”：会有多少我们不知道的类似事件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？政府到底有多少事没有告知我们？如果这件事发生在我身上会如何？

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，务虚的愤懑或批判很难真正促进社会的进步，“怪责体制等于啥都没说”，切实的呼吁和作为会更有效力。大地震的救灾历程，初步释放了中国社会民间互助的力量，虽然还有些无序与无力，仍然让人耳目一新。即使在有商业炒作之嫌的“封杀王老吉”事件中，民间力量的体现仍然让人欣慰，因为哀恸激发的价值认同正是“公民社会”的伦理基础。

在“华南虎照”事件、杨佳杀警案件，乃至奥运火炬传递、抵制家乐福诸事件中，民间力量都在悄悄地酝酿、积聚，这就是古人说的“民气可用”。然而水能载舟亦能覆舟，民间力量的规范与引导，仍然是一个复杂的命题，远有义和团的教训，近有台湾街头运动的参照，如何保持理性与独立，是以热情与公益为号召

的民间力量成长壮大必经的关隘。

## 情绪之二：愤怒

灾难让我们变得更高尚、更无私，却并没有让我们变得更宽容。2008年民间自发的批判与抵制史无前例地群体性浮现，在5月至7月的大地震余波中达到了最高峰。汹涌的言辞与持续的争论，批判对象的频密出现，上纲上线的极端取向，都让我模糊地重睹战争年代记忆的现实版。

震灾期间因言论获咎的大目标有四位，他们正是因自己的言论内容，分别被命名为“王十块”（王石）、“范跑跑”（范美忠）、“余含泪”（余秋雨）、“王做鬼”（王兆山），当然还应该包括有“地震天谴论”嫌疑的朱学勤和莎朗·斯通。但后两位的言论是被断章取义及歪曲理解的，更应该被看做非常时期公众的过敏反应（当然事件的幕后，也张挂着“左与右”、“中与西”思路歧异的大背景）。

应当说，上述四人会触怒众多的反对者，与其言论本身的极端性有关。而共同的特性，似乎都呼应着2007年“《色，戒》风波”引发的“集体/个人”两极论述。王石与范美忠都在有意或无意地强调极端情境下个人的自由选择——你不一定不捐款，也不一定会独自逃生，但“不捐”或“逃生”，可以是你的一个选项。问题的焦点是这个，至于王石之前是否欺世盗名，范美忠有没有违反教师规范，其实是另一层面的问题。即使王石是万科员工，范美忠是该校学生，“这一选项成立与否”的命题仍然有效。



余秋雨与王兆山则正好站在天平的另一端。重要的不是他们有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言论会引发巨大争议，而在于“含泪劝告灾民”与“纵做鬼，也幸福”之类的文字背后折射出的“集体利益高于一切”的思维模式。偏偏这种“集体利益”已经在过往的历史被渐渐抽空了地基，批评者质疑的是：空洞的集体利益如何替代真切的个人伤损？

将上述现象统而观之，值得注意的尚有二端：“公众”仍然处于匿名状态，我们只能暗自猜测，是否批评王石、范美忠的公众，与质疑余秋雨、王兆山的公众，分属不同的思想阵营，或者他们对两种极端的表达都感到厌恶？而公众压力的体现方式却有所不同，万科迅速增加了一亿元投资（王石因此遭到部分股东的抗议），范美忠最终失去了他的讲台，还被教育部发言人公开批评；而对余秋雨、王兆山的抗议一直限于“隐形”的状态，最多是部分媒体的批评——我无意分辨其中有无政府对舆论的控制，但这种对比至少说明，现实语境中，个人主义的主张比集体主义的言论更为弱势。

另一方面，公众情绪的表达绝非条理分明，就事论事。上述四人会被推上舆论的浪尖，还因为他们的身份裹挟着不同的“集体想象”。王石曾是公众形象最差的房地产商群体中难得的正面榜样，此次也不得不为社会上累积的对房地产商的怨气埋单。范美忠作为一个震灾的亲历者，其表现打破了灾难时期骤然上涨的道德标尺与悲情想象，又应和了旁观者对“师德沦丧”的长期隐忧。余秋雨和王兆山，是坚定的“坏事变好事”、“人定胜天”信念维护者，余秋雨自称曾对美国记者表态，称“汶川地震”比“9·11”

“更美”，着眼点显然放在中国人民的大无畏精神与集体主义情怀方面，王兆山被强调的“山东作协副主席”身份更是强化了这种思路的官方色彩。那么，余、王二人需要承担的也就不只是评论的责任，还有集体主义话语的宿债。

我们并没有完全丧失理性的声音，但灾难造成的巨大悲恸与激愤，让简单如“捐款数目即善心分量”之类的直线逻辑在这一时期拥有天然的优势，任何反向思维，即使可以自圆其说，都在此时显得不合时宜。当人们从非常时期返回日常生活，这些言论不再成为热点，但中国社会究竟应当如何判定“集体/个人”双边论述的价值与边界，必将作为一道无法规避的长期命题，横亘在伦理体系重建的路途当中。

### 情绪之三：骄傲

2008 既是灾年，也是盛世，听上去有些反讽，却是实情。

中国用了十年时间筹备奥运，不妨看做创造经济奇迹之余，试图为自身的综合强国地位树立丰碑。两年前那部《大国崛起》已经宣揭了这种心态，回顾欧美各大国的兴盛之路，暗示中国将以同中见异的方式“和平崛起”。奥运自然是最好的契机，因此筹办的每一步，工夫都要做得很足。投入之大，扰民之多，是可以预见的事实。这么一场事先张扬、如期而至的大 SHOW，不喜欢的人，当然可以说无非是八旗子弟式的耗财买脸，“量举国之物力，结友邦之欢心”。但同样不能无视的，是从政府到民众，多数人骄傲兴奋的“加冕”心态。他们对奥运本身或许看法不一，但

对于借奥运展示国家实力、增强国际地位的大前提却充分认同。奥运期间的单双号限行、周边省市停工，甚至血浆停供，引起的民意反弹都远远小于平日。大多数中国人的爱国热情也在8月的晴空下达到最高点。

这届奥运会注定是有史以来最盛大的一届，也是最古怪的一届。其古怪处在于，它口口声声宣称体育与政治分离，不希望奥运会泛政治化，针对的是西方“反华势力”借机兴风作浪；另一方面，它的筹备方式、资源调配、举办过程、运作目标，又有彻彻底底的政治诉求——我这里说的不仅仅是政府，也包括无数热血民众的心理状态。

为了观看神舟七号，许多地方的小学特意放假，以便学生们能够从小目睹祖国的伟大。好事者计算着这桩盛举在CNN、BBC的新闻时段里占用了几分几秒。体育或科技的泛政治化，源于对国族身份的热爱，而热爱源于对自身实力的骄傲。中国民众对西方媒体的要求，已经超越了“不抹黑、不造谣、不反华”的基本面，他们不平的，是西方媒体对这个地球村中越来越重要的成员有意的忽视与低估。正如中国古语所言“兄弟阋于墙，共御其侮”，民众并不因仍然存在的对政府的种种不满，而全面认同西方一如既往的价值观输出。

在3月与4月，即使是那些后冷战时期生长的中国人，会承认自己也不清楚拉萨藏独骚乱的真相，但仍会坚持“西藏不能独立”与“火炬传递不应受到干扰”的立场。这与其说政府的爱国主义教育洗脑成功，不如说是历史文化心理的积淀所致。一本出自韩国人之手的《漫话亚洲》指出，中国人的基本精神诉求

是“一”，统一才能强大，才能博施济众，才能成就一个国度的伟大与民族的复兴。在这一宏大的叙事面前，西藏的经济发展、民众生活理所当然地拥有超越性的地位。

4月民间自发的“抵制家乐福”运动，是自1905年以来最奇特的抵货运动。它不像以往那样源于民族产业的困境，也没有任何经济诉求，而是以一种消费主义的姿态将民间的爱国热情物化，与地震后消费者因莎朗·斯通言论抵制Dior化妆品如出一辙。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对中国地位的反向确认：中国市场的波动会影响那些高高在上的跨国企业决策，而中国消费者也有着可以替代的不同选择。因此抵制家乐福与Dior的象征意义远大于其实质影响，正如遍布MSN与QQ上的“红心”，强化着整个社会的国族认同与情感融合。

这些活动以“80后”为主体，或许说明中国社会的主流价值正在发生悄悄地转变。“80后”的成长环境决定这一代人更坚决追求“我”的价值实现（扩大而言则是国家的价值体现），而他们习惯的方式是经济抵制而非政治抗争。但是，“去政治化”真有可能实现吗？华中政法大学两位女生控告任课教师，理由是“你怎么能反对中国文化与政府”，或许只是个案，但政治无法规避，却是不争的事实。

为盛世加冕的，不仅是现实，还有历史。2008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，纪念与回顾理所当然成为热潮。每个人都能感受到这30年的巨大进步，可是没想到经济学家们把“中国经验”抬高到如此让人仰望的位置：张五常说“县级竞争”是有史以来最好的经济制度；林行止承认自己当年对自由市场的无保留揶揄是一个错

误；还有各色经济学者总结的“中国式道路”……这些标签在西方再次步入经济衰落期的背景下更显得熠熠生辉。

报章杂志则用无数的老照片、旧文字告诉我们：中国社会曾经度过怎样的日子，从现在看去，那时是那样孤陋，那样匮乏。然而怀旧的情绪从未消失，过往岁月在被时间过滤之后，似乎荡漾着今已不存的单纯与美好。每一个时代，都在滥用狄更斯“这是最好的时代，也是最坏的时代”的辩证逻辑，现实的不满总能在往昔寻得对照的资源。

## 情绪之四：惶惑

奥运开幕前，金融危机已初露端倪，一边是暗流涌动，一边是如火如荼。我听一位央视主持人感慨道：“奥运之后，老百姓经过鸟巢，经过巨蛋，经过央视大楼，他只会说：咱们那时候真有钱！”如今楼台灯火，倏忽一梦，人群的心态发生巨大转折，8月的辉煌热闹似乎已是遥远的记忆。

经济危机，这个书本上的名词突然踏入了生活。多数中国人还在费劲地理解大洋彼岸的“次贷”是什么意思时，一转眼已是长三角、珠三角工厂倒闭潮，民工返乡潮，房价泡沫随风而散，上证股指一年间已经从6100点跌到1600点。早在2007年“全民皆股”时，就有人说“下半场还没有开始”，经历过低谷才能完成民众投资教育。今年下半场开哨，但谁能想到等来的是金融海啸？

通过经济危机许多人才第一次发现：原来社会经济各部门真

是“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”。亚洲金融风暴下香港、日本民众的艰难生计，以前只是在电影、电视上看过，如今似乎要在中国大陆重演。政府失灵还是经济失灵？经济学者在追问，可是普通人更关心什么措施能够救市，危机何时才能消失。

股民其实相当理性，他们一边看着绿得发惨的显示屏，转身还在为中国运动员加油。大家在“比惨”、“比衰”之中寻得些许心理安慰，苦笑着等待解套的一天。新房业主们则更激动，南京、杭州等地都出现了冲击、打砸降价房地产公司的事件。公共舆论不会支持这种“有违契约精神”的行为，但个中人的心理状态值得玩味。网上有文章分析过“为什么房价跌比股价跌更难让人忍受”，关键在于前者主要借助银行贷款，股票就算一钱不值，也不是“负资产”吧？于是，美国式的银行放贷时紧时松、繁荣后潜藏危机的问题，也被摆上了桌面。

史料显示，北平、上海沦陷后，市民的普遍恐慌并不始自日军入城之时，而是由主食销售匮乏引起。同样，经济危机尚不足以让社会产生普遍性的惶恐，但“三鹿奶粉事件”却让民众信心降到了最低档。而且，民众丧失的是双重的信心：对政府监管的不信任感从来就有，如今变得更加剧烈；而用30年时间培育的对市场的信心，也在一夜之间跌到冰点。如果天文数字的品牌价值尚且不能阻止产业潜规则的横行无忌，还有什么能保障中国社会“免于恐惧的自由”？

更让人心寒的是：三鹿的被揭发，似乎更像一个偶然事件。从奶业同行到地方政府，仍然是采用能捂就捂的精算策略，健康与生命并未得到应有的尊重。香港媒体就曾质疑“为什么食品质

量问题都是在境外被曝光”？刚刚奉献了奥运大戏的中国，怎样才能证明自己是一个有自我管理能力、纠错能力的社会？中美互设食品监管机构，反映出的是世界对“中国制造”缺乏信任，中国社会也自信不足。

“百度竞价排名事件”又给了本已脆弱的消费信心沉重一击。商人逐利当然无可厚非，但搜索引擎的商业模式建立在用户的信任与依赖之上，如果搜索引擎变成小广告发放者，造成的隐形伤害又由谁埋单？何况百度在三鹿事件中已有收取“封口费”的前科。可惜的是，只看到许多人将搜索工具默默换成别家，却不见抵制家乐福、抵制 CNN 式的大规模抵制活动。这说明，“抵制”背后的伦理观念，仍然有着很强的不确定性。

## 情绪之五：反讽

权力滋生腐败，绝对权力滋生绝对腐败。权力的运用与监督，在中国社会确乎不够透明，久而久之，民众就产生了“对权力的绝对警惕与绝对反感”。

拉萨骚乱与瓮安事件，新闻报道的滞后明显加重了公众对权力的不信任。接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，展现了权力方的“舆论弱勢”位置，也凸显了公众情绪的暴戾成分：杨佳杀死了六名警察，却在网上被捧成了“刀手”、“大侠”；哈尔滨警察打死大学生案，舆论先是一面倒地谴责警方，但在传出“死者出身高官家庭”的流言后，许多人的评论马上转成了“六提辖打死林衙内”；林嘉祥酒后闹事，证据尚未“呈堂”，没有耐心的观众已经自然推

断他猥亵女童；程春明被学生用菜刀砍死，也有快意的看客说成“谁叫他勾引女学生”……

公众情绪并非无源之水，也并非无的放矢，“对权力深刻的怀疑”在上述每一桩个案中闪现，未尝不是对“人情大于国法”弊端的一种针砭，有时甚至是公众情绪对“合情不合法”现象的隐形抗争——不独中国如此，全世界网民“违法”地传看陈冠希电脑里的艳照，也是同质的例子。但是，暴戾的公众情绪一旦产生，必然遮蔽细节的发掘、真相的剥取，甚或成为被某方操弄的对象——哈尔滨一案的进展显示警方对录像带进行了剪辑，公众情绪被顺理成章地导向“恶霸打警察，警察正当防卫”的情节模式。设若死者真是恶性执法的牺牲者，这种公众情绪，便是对在生者的二次伤害。

指责公众情绪没有意义，需要探究的是何以会出现“正义变为暴戾”的现象。流言从不缺乏将事件合理化、合情化的想象力，如杨佳杀警，盛传他是被警察殴打后失去生育能力才萌发恶念，这个未经证实的细节被放大，成为许多人支持杨佳的最大论据。而未敢轻易置信的观察者，也无法辩驳这个论据，因为整出案件的审理一片模糊，程序也存在多处不合理的环节。

因此，对杨佳的行为做出价值判断，是非常艰难的一件事。反讽的是，将杨佳捧为“侠客”者，与那些千方百计掩盖杨佳案真相的人，其努力的方向其实一致，那便是将个人类型化、个案普泛化，让原本可能是简单的恶性刑事案，变成公众对警方的声讨，对法治的怀疑。

周正龙案的宣判同样具备这种反讽的效果。原本积极“打



虎”的舆论却在一审判决后纷纷转向为周正龙叫屈，反对将所有责任都归于这个年过五旬的农民。有意思的是，法庭似乎顺从了舆论压力，没有出示任何理由，便将周正龙改判缓刑。周正龙释放，突然成了控辩双方共同努力的目标，而这一目标的达成，却导致“正义还在流浪”，“打虎”实质上失败，而政府声誉也未得到任何修复。

一方面，公众在不断地呼唤正义；另一方面，中国社会还不太习惯去支持那些出于私利的正义举措。“黄静诉华硕维权案”历时数年，仍然是一团乱麻，看不见解决的曙光。华硕与百度一样，打死也不承认自己犯错在先，理当屈己示歉。几年前，他们以勒索的名义报警，抓捕了黄静。可是，黄静有没有权利将华硕欺瞒消费者的事实曝光？有，那么华硕想私了此事，任何条件都应当允许讨论。但舆论焦点却模糊在“黄静索赔是否超过其损失太多”的伪问题上。而黄静及其代理人再三强调“钱是用来建立消费者基金”，明显也是顾忌“小人喻于利”的主流价值观。整个事件仍然在“集体/个人”、“公域/私域”的吊诡论述之中鬼打墙。

公域/私域的混淆，或许是公众面对各类事件歧见丛生的最大原因。学习如何在公共论域讨论问题，将讨论局限在社会影响层面，而非揣测个人动机与张贴道德标签，这同样是建设“公民社会”的要义。2008年，中国大陆社会对于异域的两场大选，给予了前所未有的热烈关注。直接采访、观察的媒体远远超过以往。经济危机下的选举，让公众的选择趋向避开意识形态，做出务实的评判。近距离的观察与多元化的信息也让我们将更多